◆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二七期 ——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112b)

【史实辨析】 关于"破四旧"的反思与追问

——兼评《王力反思录》之有关内容

米鹤都

【口述历史】 访谈文贯中(上)

文贯中 • 顾训中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 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 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 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实辨析】

关于"破四旧"的反思与追问 ——兼评《王力反思录》之有关内容

• 米鹤都 •

〔作者按:《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于2011年8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发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内容只能割舍。这里,作者将其中涉及"破四旧"的部分内容整理为一篇专题文章予以发表,作为对《心路》一书的一点补充。由于本文属于节录,独立成文难免有内容上的缺失及逻辑上的不周全,特别关于红卫兵们为何会参与其中及其所应承担的责任等没有涉及,请参阅《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敬请读者谅解。〕

破四旧是文革历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当前的众多研究和社会上对此事的认识大多是把它归咎于红卫兵们的残暴。这固然是事物的表象,然而将这种震撼社会、惨无人道的"运动"仅仅聚焦于当年13-19岁的中学生,对于我们深入反思这段历史显然是肤浅的,甚至是一种偏差。其道理本文不展开论述,可参见《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的有关章节。

本文认为,对破四旧需要分析一下其为何成为红卫兵运动乃至文革初期的爆发点?以及在一个成年人主导的社会中,它怎么会成为一种现实?

破四旧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十六条"中所说的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是所谓四旧的载体——"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或者说,破四旧的开端主要是针对前一对象,以砸招牌、剪发型、改路名等为主;但是马上就转向了后者,以抄家、打人、遣返为主要内容。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太多的内在联系和共性,但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转换对象、并以如此之猛烈的程度展开呢?这也是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本文在破四旧后一对象的概念上,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些初步的分析。

一、破四旧是保卫毛主席和净化北京城的延续

文革之前,毛泽东自1965年10月即离开北京,一直以杭州为基地巡视流连,流连于 江南而拒绝返回北京。甚至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也并未出席。从表面看,这很不正常, 政治局讨论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此重大的问题,主席居然不参加会议。这从程序上和内容上都令 人不解。以前的论者大多认为这是毛泽东的欲擒故纵,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布局或者是一 种策略。根据现在的资料看来,他更多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毛泽东后来对外国友人说:公开 发表改组北京市委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林彪讲话则谈到:这次彭真的问题出来后, 毛主席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部署。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 文章,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可以这样说,"文革"发动前夕,毛泽东对党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为确保安全,他进行了缜密的布置。在毛泽东授意下,周恩来成立并亲自主持了密级甚高的"首都工作组",甚至林彪、江青都未能参予。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下设七个小组:其任务分别是:一、除了调动前面提到的两个步兵师作为北京卫戍部队外,负责其它警卫部队的配置和调动;二、负责社会治安;三、清查民间的枪支弹药;四、清查敌特和私人电台;五、清查清理社会人口;六、加强看守和监督监狱服刑人员和劳教人员;七、外事保卫和清查华侨。〔1〕可以看出,这个工作组的重点是将北京市过滤成一个"纯净"的城市,以保卫毛泽东和文革指挥中心的安全。除第一项外,这个组织的工作载体主要是与各级公安机构和街道委员会相结合。

在这种布局下,文革中北京的第一批遣返是在1966年5月,而非始自于破四旧。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当月,就立即"动员"了一批"四类分子"去新疆等地。周恩来是这样讲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总要把地富反坏弄走。"〔2〕天津市公安局也曾在1966年7月,计划将原籍河北的四类分子4500多人遣返回乡,监督改造。〔3〕北京破四旧中的遣返,现在无从考证最早出现的具体事例及其背景。但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在红卫兵成立之前,北京的遣返已经启动。遣返的做法并非是红卫兵们想出来的点子,它是与"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方针密切相关的。毛泽东对此曾提出意见,于是这一工作在6月中旬告一段落。周恩来也承认"当时将一些坏人向新疆送了些,可能送的多了些。"但是这项工作并未终止。

还有论者指出: 遗返地富反坏右的问题,与所谓净化北京城的大政策是相关联的,北京市在彭真主政期间就有过"净化北京城"的计划。〔4〕当然,这是指"文革"前的阶级净化而非环境净化。但是,和红卫兵的抄家遣返直接相关的,是出自于保卫毛主席的需要而产生的"首都工作组"。也就是说,北京对"四类分子"的遗返是文革前就已经确定并正在执行的政策。

根据一位当事人回忆:"对社会人口的清查、清理工作,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不知伤害了多少人,不知使多少人陷入了无边的苦海,甚至遭遇灭顶之灾。这个灾难也不都是'首都工作组'造成的,按当时规定的政策,第一步是清查,第二步是通过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民委员会,说服、动员其迁出北京。但是,这项工作很快就被'红卫兵'冲乱了,他们根本不讲

什么政策,统统先揪出来批斗,然后赶出北京。"〔5〕

可以说,红卫兵兴起后,自然而然地将破四旧与首都工作组的任务衔接起来。这是因为,上述的七项工作,其中的第3、4、7项是属于内部掌控的,在当时法律框架尚未被完全破坏的情况下,政府机构无权随意搜查嫌疑者的住所。而红卫兵们的身份却可以让这三项任务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了。第2、6项任务实际上也转交给了红卫兵去执行,所以出现后来的"打流氓"。而第5项任务更成为了抄家、打人、遣返的依据。

从这个历史逻辑出发来认识破四旧,就接近了历史的真实。当然,现在还看不到有档案文字表述的这一工作上的"衔接"。实际上,红卫兵们的抄家除了一少部分是红卫兵们自发地寻找对象外,多数是在当地派出所和街道委员会的引导下发生的。

二、国家机器的怂恿和纵容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在当年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根正苗红的公安干警特别是那些"片警"们,衡量其工作的第一标准显然是对保卫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和高度责任感。他们也巴不得使自己的辖区"纯之又纯"。谢富治为首的公安系统领导人很快指示他们,要积极配合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因此,大多数公安干警们主观上是欢迎破四旧的,甚至可以说红卫兵们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他们的工作。于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仅仅是配合了,而是主动地引导着红卫兵们的行动。于是,抄家、打人就大规模地出现于天子脚下的京城了。

- 一些红卫兵当事人对破四旧的回忆中,大多数人都提到了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的恶劣作用。举几个事例说明:
- 一位访谈者说:我很熟悉的一个北京的红卫兵,他们到上海串连时,抄家并打死了一个老华侨。这件事当时在上海很轰动。实际上这是当地的一个派出所所长,还有一个里弄的居委会主任,老想整一个老华侨。但华侨的身份特殊,他们整不了,就利用北京红卫兵不了解当地情况,介绍说这个人是老资本家,还死不承认。结果,这些北京的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就抄家打人。老华侨是在东南亚割橡胶的工人,回国用毕生的积蓄买了一个房子,养老来了。他很硬,死不承认自己是资本家,当然他根本就不是。最后,就这么被打死了。后来在江湾体育场斗争了打死人的红卫兵。不过在当时政策下,后来还是把他放出来了。〔6〕

另一位访谈者回忆:大概是9月份,抄家风已经过去了,可当地的派出所找上门来说,有一个很有特务嫌疑的人,你们能否把他家给抄了?那时,我们也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就去抄人家。结果发现这家人好像是华侨,而且和总理的关系非常密切。有很多总理写给他的信和他们写给总理的信的底稿,还有和总理的合影。〔7〕

指挥过多次温和抄家的一位访谈者说: 当年抄家这些事情全是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搞的,那帮孙子到处给提供名单,说,我们胡同有一个什么什么人,你们去抄啊。这帮人就去抄去了。那时候抄家全是坏人引道,这些学生知道什么呀?〔8〕

即使在老干部层面,对破四旧的态度也是欣赏的。叶剑英曾讲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16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也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

违反一点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9〕这表现了党内 高层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认识。

另一方面,文革发动后,大多数老干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把斗争矛头指向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不仅政治上安全,甚至也是一段时间内,动荡中的各地党政负责干部转移视线、寻求自保的一种做法。他们显然乐于看到红卫兵这股祸水冲向"传统"的阶级敌人,而非《五一六通知》中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三、背后的经济动因

在以往对破四旧的研究中,往往还忽略了另一因素,即隐藏很深的经济动因。众多警匪片给人们展现了这样一个破案规律,即一个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其主谋或是主要责任者。 在历史研究中,这一思路也许同理。

1966底起,大量破四旧中被遣返的人员开始要求返回北京。于是,中共中央在1967年3月18日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颁布的《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该《办法》共10条,规定了10类不准返回北京、就地接受改造的人员。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第6条中的"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资本家在文革中被扩大化为阶级敌人,还多少可以理解。但把"房产主"列入为阶级敌人的概念,也许是首次出现于中共中央文件。按照常理,解放初期大房产主被视为资本家对待,公私合营时其房产早已被改造过了。因此,这里的概念理应是指小房产主、小房产出租者。但是,这批人在建国初确定阶级成分时应当被定为小业主,并不属于阶级敌人的范畴。中共的阶级路线,从来没有将小房产主、小业主作为敌对势力的政策。但是,在这个《办法》中却将其与"地富反坏右"同等待遇。当然,可能为了避免被误解、引申,前面加上了"坚持反动立场"的前缀。不过这当中有一个奇怪的逻辑现象。"坚持"意味着以前就"具有",否则怎么坚持?但是如果他们以前不是阶级敌人,何来的"反动立场"呢?

根据这样一个逻辑,这些房产主如果以前不是阶级敌人,那么其反动立场只能是来自于文化革命之中了,准确地说,就是对待破四旧、抄家和遣返的态度了。第一个问题是,这批人如果不是"黑五类",为何又会被抄家遣返?合乎情理的看,显然是与当年的住房紧张有关,从而导致对于收取房租、有剥削行为的房产主强行剥夺。第二个问题是,这批人如果不属于"黑五类",怎样才能让红卫兵抄他们的家并遣返他们呢?这恐怕就应当归功于北京众多的派出所民警、居民委员会以及街道积极分子了。依据当年的理论,出租房屋的小房产主尽管属于轻微的、但依然是一种剥削行为。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你没"渣儿"。其余的一切,都是可以依靠三寸不烂之舌解决的了。什么政治态度了、反动言行了、生活腐败了、攻击红五类了……那个时代这些可以信手拈来的理由,实际构成了所谓的"反动立场"了。

另外,《办法》之所以强调了房产主,就说明它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涉及一个批量级的群体。而他们即使在红卫兵的破四旧名单上,也应当属于错划、错抄更是错误遣返的一部分人。而他们却真实地成为了抄家遣返的对象。至于怎样形成了这一现象,就和它自身的可操作性有关了。关键的一点在于:当年的抄家、遣返是没有组织程序的,也不需要审批的,也不是某一学校的某一个组织可以做而别人不能做的,而是所有学校的所有红卫兵组织都可以做的。说得极端点,甚至是三两个有红卫兵袖章的一吆喝,跟上五六个人,就可以完成从打人、刑讯、批斗、抄家及遣返这样一个过程。说明这一点,也就说明了在当时的政治旗号之下实现某种其它经济利益,完全具有可行性。小房产主们遭到这样的打击,"黑五类"们的命运更可想而知。于是,打击面越宽,某些人的潜在利益就越大,这似乎是一种正比关系。当年土改分房、分地、分浮财的经历,对于很多人来说依然记忆犹新。因此,破四旧时对抄家和遣返热情最高的社会群体,恐怕

倒并不一定是那些红卫兵了。

这一中央文件的关键还在于强调了这批人遭到遣返并不准返回。但是不让他们回来在道理上又说不过去,于是给他们加了个"坚持反动立场"的帽子。这纯粹是错了也不认账。为何会这样,不难发现某些潜在利益已经转化成为既得利益,背后有着强大的既得利益的支撑。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在"红八月"之后不久,那些被遣返的住户的房子,都优先分配给了红五类的积极分子,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而北京城区的所谓红五类,其中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基本不会参与到这种分配之中,市区也没有贫下中农,真正得益的是工人家庭和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其它职业者。众所周知,北京从来不是一个工业城市,解放初期产业工人少得可怜。被划入革命依靠力量的"工人"大多是原来的城市贫民,即马克思阶级分析中的流氓无产阶级阶层。这个阶层是产生街道积极分子的主体,也可以说是从"破四旧"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最大受益群体。另一部分得益者则是陆续改造公检法而调入的大批外地的复转军人和基层干警。在鹊巢鸠占之后,那些被遣返的家庭就无形增加了返回北京的困难。《办法》的政策取向和表现出的经济背景就不言自明了。

甚至在破四旧中被抄来的家具、衣物等生活用品也多在1967年初前后,以极低的价格、以"抓阄"的形式卖给了出身红五类的市民。可以说,抄家、遣返除了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政治原因外,内在的利益驱动也是构成破四旧迅速扩大成势不应被忽略的因素。但是,红卫兵们的疯狂、愚蠢,则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棍子和日后承担责任的债主。

四、舆论导向是破四旧迅速发展扩大的重要因素。

从《十六条》提出破四旧,要求人们"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倡导"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捧杀中学生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些,显而易见是要把这些多数未成年的孩子推向邪恶。

到了破四旧、打人以至打死人最为猖獗的8月底,《人民日报》8月29日发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题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其煽动性极大。其中说到:"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10)

那一时期,这样的文章、讲话、广播稿比比皆是。直到1966年9月17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红卫兵赞》的评论员文章,从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舆论对红卫兵那种吹捧和狂热达到了何种地步,主导社会的成年人要把红卫兵们引向何处。其中写道:

"现在,全国革命人民争夸红卫兵。

红卫兵的革命首创精神,震动了全世界。

红卫兵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

红卫兵是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红卫兵们说得好: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我们的红卫兵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最爱听毛主席的话,最热爱毛泽东思想,他们随身带着《毛主席语录》,把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最高的职责。

千百万红卫兵由学校走上街头,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们高举战无不胜的毛

泽东思想红旗,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荡涤着旧社会 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扫着几千年来堆积起来的垃圾脏物。

红卫兵干了大量的好事,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的革命行动,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蓬蓬勃勃的群众运动。这种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使钻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这样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就不能摧毁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社会基础,就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

红卫兵是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新生事物。革命的青少年是无产阶级的未来和希望的象征。 革命的辩证法告诉我们,新生的力量是无敌的,它一定会在斗争中获得壮大和发展,最后战胜 腐朽的力量。因此,我们就是要赞美新事物,歌颂新事物,为新生事物的发展,擂鼓助威,鸣 锣开道,高举双手,欢迎新事物。

我们的红卫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建了不朽的功勋。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地赞 扬他们的冲天革命精神,广大工农兵群众热烈欢呼他们的革命行动。

革命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真是好得很!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绩,将永远载入无产阶级的革命史册。"(11)

此外,这篇文章还用了大量的篇幅,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学着当年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口吻,驳斥了那种认为红卫兵运动、"破四旧"糟得很的论调:

"对待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看法,革命的阶级认为好得很,而反革命的阶级则认为糟得很。

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拍手欢呼,向红卫兵致以崇高的敬意。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则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红卫兵。他们污蔑红卫兵是'少年狂热分子',攻击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是'违反人类尊严',是'破坏社会传统',等等。

毛主席教导我们,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红卫兵受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起劲的反对,这真是光荣得很。

'少年狂热分子'。革命的敌人总是极端仇视群众的革命热情,并诬之为'狂热'。敌人所恨的,正是我们所爱的。革命小将们,不仅要继续保持充沛的革命热情,并且要进一步发扬这种冲天的革命精神。

'违反人类尊严'。红卫兵无情地鞭挞、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的文化,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于是他们大叫:'违反人类的尊严'。老实说,我们不仅要违反你们的'尊严',而且要把你们打倒在地,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

'破坏社会传统'吗?你们说对了。红卫兵就是要破坏地主资产阶级的传统。革命的小将们,对于封建主义的余毒,资本主义的病菌,修正主义的祸根,就是要扫清、灭绝、斩断。只有彻底破坏了剥削阶级的种种旧传统,才能够继承和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

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红卫兵小将们,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挖掉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埋在我国的定时炸弹。因此,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感到震惊、恼火和愤恨,这是很自然的。

反动阶级的代言人罗马教皇保罗六世无可奈何地供认,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对他们来说'是死亡的象征,而不是生命的象征'。不错,革命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确确实实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最后灭亡的象征。而我们的红卫兵,则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欣欣向荣,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当年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实际已经把对待红卫兵运动、"破四旧"作为了划分革命与否的态度。这不仅代表着中央高层对破四旧的基本立场,同时也是指导人们行动的准则和号令。这时全面主持《红旗》杂志工作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我们再看看王力今天是怎样解释这个问题的。

五、评王力关于破四旧的辩解

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认为今天人们对毛泽东的态度产生了误解。

他是这样解释的:"破四旧不是毛主席的思想,同毛主席的思想相违背,不一致,不合拍"。"红卫兵搞得天翻地覆的,首先是破四旧的运动。有些历史学家不知道毛主席对破四旧的作法实际态度是什么。据我和毛主席接触中的了解,他是不赞成破四旧的。我也不赞成。我跟陈伯达提过,我说四旧这提法不科学,根据毛主席的思想,不应这样提。这口号很笼统,没有个界限。林彪的报告也提了四旧,但他也没有叫人们对四旧这样搞法。……林彪讲话有这提法,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论中也这样提了。林彪接见红卫兵的讲话号召破四旧,这讲话稿毛主席也看过,当时也不知道会产生这样大的后果。毛主席对当时的中央领导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集中目标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搞破四旧这些东西,毛主席对此并没有欣赏。林彪、陈伯达也没有号召这样去搞。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具体工作的同志对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新华社提倡这样搞。红卫兵8月20日第一次上街,砸招牌,改路名,人民日报说好得很,新华社作(做)了详细的歌颂性的报道。在这一点上,毛主席对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不满意。但群众行动也不好去制止。也没有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一出现打人,毛主席就说不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就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这是毛主席的思想。"〔12〕

王力的这段话,引导人们得出的印象是:毛泽东一不赞成破四旧,二反对打人,三打人现象一出现就开始纠正。而且,王力本人也不赞同破四旧,林彪虽然提了破四旧但并没有让人这样做。所以"文革"出现的破四旧、打人和毛主席的思想无关,责任界限可以说划得很清楚。

看了这段话,你很难说王力谈的不是事实。客观地说,王力的话确实反映了问题的一个侧面,但却并非全部;二是这当中王力有意无意地隐去了一些明显的史实,但又绝非完全造假。这样读下来,不熟悉当年历史的人多会认为他讲得颇有道理,何况这些话出自于毛泽东身边的王力之口呢,因此必然引导读者得出王力希望人们得出的结论。

在这点上,王力不愧为中央级的"文胆",他写这段话的目的的确达到了。不仅具有浓厚的为尊者讳的色彩,也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但细究起来,王力这段话的问题甚多。严格意义上,他的这种"春秋笔法"远比那种硬把黑的说成白的高明得多,但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对人们的误导却也严重得多。对这种似是而非的"史料"和"反思",必须严肃待之,否则会误导后人走向历史事实的千里之外。正因此如此,很有必要对王力关于破四旧的"反思"再"正思"一下。

其一,"四旧"一词,首先见于《五一六通知》。这是毛泽东和身边一群秀才千斟酌万修改的纲领性文件,能说它不代表主席的思想?有点离谱。另一事实是,林彪从"八一八"的讲话到国庆节的几次讲话,都是由陈伯达等代为起草、由毛泽东亲自审定,再交由林彪念的。其目的不言自明,就是要将林彪为首的军事力量挟入支持文革的社会基础之中。所以说,毛泽东不主张、不赞同破四旧是背离历史事实的。

不过,王力的文字表达确实很艺术。他说:"只搞破四旧这些东西,毛主席对此并没有欣赏。"如果人们要表达对此的否定意思,通常会使用简单的句型,如:"毛主席并不喜欢破四旧这些东

西"。王力驾驭语言的能力绝非等闲,却为何把话说得这样拗口,还是一个倒装句?反复看了两遍,才看出玄机。请注意这个"只"字,一般读者读起来往往会忽视,但是实际意思完全不一样。此其一,以含混误导。其二,它暗含着另一层逻辑推理,就是如果不是只搞破四旧,而加上斗走资派,毛泽东就会很欣赏了。如果说毛泽东最初并不一定赞同"破四旧"搞得如此天翻地覆,特别是转移了文革的大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王力的话可能是对的。但是说毛泽东不赞成"破四旧",言过其实了。有文字记载的史料表明:

8月20日,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反映破四旧的简报上批示:"已阅。(破四旧)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13〕另一件是在破四旧的高潮中,毛泽东把吴德找去汇报情况。吴德写道:"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14〕这也是上面引述的叶剑英讲话的主要意思。

吴德用了"雄才大略"和"超乎常人"两个形容词,话中有话地点到为止。这说明了他作为一方大员对当时混乱的血腥局面的无奈,但是很明确地说明了毛泽东对破四旧的基本态度。从毛泽东这两段话中,退一步说,即使他对破四旧不"欣赏",也不是因为破四旧的惨无人道,而是因为它干扰了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王力以说"禅"的方式来隐晦历史,但表面上确实并没有犯历史错误。这是其高明之处。

其二,把"破四旧"全面引向社会,固然像王力所言,主管宣传的陶铸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刀笔吏们具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但王力的话又很值得怀疑。文革前宣传口就是因为不贯彻毛泽东的精神,才成为了文革的重灾区。文革后,哪怕是宣传口的新领导和继续留任的工作人员,无法想象他们还有胆量在这种极端敏感的问题上予以自由发挥?即便如此,连篇累牍鼓动破四旧的文章发表,毛泽东的不管不问就是他的态度。特别要指出的,上面大幅引用的《红卫兵赞》,就是王力主持下的《红旗》杂志的重头文章。如果说这种宣传王力是出于迫不得已、是来自最高层的精神,又怎么能说这不是主席思想呢?如果这不是来自最高层的精神,那么王力所言又出现了矛盾:

矛盾一,既然宣传有纪律不能自主,何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自主"地提倡破四旧呢? 矛盾二,既然文章的精神不是来自高层,那么这篇文章为何署名"评论员文章"?这样的署名, 过来人都知道它的分量。矛盾三,哪怕就是《红旗》杂志自己的主张,王力总不能说这篇文章 不代表他这个总编的观点吧?那么他怎么敢说他连"四旧"的提法都不同意,却还在9月中旬 还起劲地肯定和鼓吹破四旧呢?王力如果在世,不知他怎么能说圆这些自相矛盾之处?

其三,王力认为一出现打人,毛主席就开始纠偏,显然与事实不符。1966年6月北京的批斗会已经出现打人现象。北京大学6月18日打斗干部教师的事件已经很严重,北大工作组连夜向中央上报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但是,正是来自高层的指示将已下发的第9号《简报》撤销。这是哪里来的精神?谁又有这样的权威?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芸被一群女生打死,此事当天被刘进和宋彬彬报告到正在参加中央全会的吴德那里〔15〕。吴德对文革初期这样草菅人命的事情,有无胆量瞒住不向最高层报告?如果说毛泽东真有"一出现打人,毛主席就说不行"的那种思想认识和言论,在6月到8月、乃至9月却没有从任何渠道传播出来他的指示,哪怕是某种精神,实在说不过去呀。

恰恰相反,人们看到的则是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讲了"要武嘛!"这三个字的历史作用不可小觑。陈小鲁在受访时对此印象深刻,他说:这句话真是要命啊!在这个"要武"出来之前,我们还可以控制住局势,因为《十六条》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这个

"要武"出来以后,我们就没法管了。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是主席有意提倡,可能随口说说而已。但是对于普通学生来讲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就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16) 关于"要武嘛!"三个字,宋彬彬也认为可能是主席随便说说。但是"君无戏言",这至少反映了他的一种心态。而且经媒体大加渲染,其后果是什么,过来人都清楚。当然,毛泽东确实也说过反对打人的话。8月21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过"提倡文斗,不要武斗",但最关键的是他同时又说了,"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17)这两句话在一起听,是该理解为制止打人呢?抑或叫做纵容?

其四,破四旧把打人全面推向社会,大面积的打人是破四旧的孪生兄弟。当时北京破四旧最大也是最核心的是抄家、打人的问题。要制止打人必须制止破四旧,这应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可上引王力的话前面讲的是破四旧、后面讲的是打人,它给人的感觉好像这是两回事,其实是在进行偷换概念。

它给人的另一感觉,是毛泽东、林彪1966年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即在对打人纠偏。而林彪8月31日和9月15日的两次讲话,都对破四旧予以了充分和高度的肯定。他谈到:"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也就是说,到9月中旬,中央高层没有对破四旧正式纠偏,而且认为"做得对,做得好!"。"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红卫兵们通过暴力手段进行的吗?北京市这期间打死了一千多人,难以想象毛泽东等人没有耳闻?他们不了解破四旧和打人的关系吗?一面在大力支持破四旧,一面说是在制止打人,这在逻辑上说得通吗?王力恰恰是通过割裂一对连体双胞胎,来掩饰一些真相。

其五,"文革"中盛传是江青的一句名言,"好人打坏人活该",对打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段话实际上倒是来自毛泽东的精神,江青不过鹦鹉学舌而已。江青1966年7月28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中学生代表大会上说:"人的错误思想是打不掉的,但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18)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让人感到它是在制止还是在鼓励打人?

其六,如果说毛泽东是出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像王力解释的那样,是考虑到"群众行动也不好去制止"的话,那么当时并不缺乏适宜的可利用物。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写了"十点估计",西纠的若干通令都包含有制止打人的积极内容。以群众的一种"首创"去化解另一种"首创"也好,理解为"以夷制夷"也好,都是可资利用的手段。不仅完全可以摆脱这种干系,它不也是一种"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吗?但没有见到毛泽东对这些出自部分红卫兵之手的、制止武斗打人的文件予以任何肯定和宣扬。在王任重印发了"十点估计",希望借此来稳定局势的时候,〔19〕反倒是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说:"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20〕他对"十点估计"提出的制止打人表现出了明显的否定态度。

其七,另一个更说明问题的事实是:破四旧刚刚兴起的1966年8月21日,毛泽东批转下发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次日,又批转下发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报告。后一报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这一条比什么都更说明问题的实质。北京市公安局实际上执行的就是"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警察一律不得进入中学"的政策,这政策从哪来的?同月,谢富治在公安系统会议上又讲:"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21〕

以谢富治的谨小慎微和紧跟,他的这个"我看"能是他个人的意见吗?实际上这才应当是最高层的态度。

六、从《王力反思录》谈文革反思

如前所述,破四旧的史实其实都是清楚的,王力都是知情的,但他怎么可以把这段历史描写成前引的那段文字呢?真把历史当成"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对此,笔者有三点感触:首先,王力为尊者讳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点即使他的儿子也看得很清楚。王力之子王鲁军在《王力反思录》的"再版后记"中谈到:"其实,就是我父亲写的这部《回忆录》,也没能完全避免'为尊者讳,为正确者藏'的问题,为维护毛主席和一些革命老前辈的威信,他也回避了一些问题和看法。"〔22〕但是,如果把历史说成:破四旧"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具体工作的同志对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新华社提倡这样搞",就大相径庭了。这不仅是"为尊者讳"这种还能让人理解的感情问题了,而是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歪曲了。其次,文革研究中所反映出的感情色彩太强烈了,王力这篇文章就是一例。因此提示我们在研究中必须学会甄别,去伪存真,否则势必误导后人。再者,实在不敢恭维的是,以当年参与中央高层决策的王力,其水准实在不应当在这短短几行字中,就出现这么多史实乃至逻辑方面的低级错误。以小人之心度之,如果他是有意为之,那么他的目的达到了,堪称佳作,其结果势必误导后人得出与史实相反的结论;如果是信口而言,那么我就对这位被毛泽东欣赏的"顶级文胆",不仅从能力上甚至从智力上予以怀疑了。

关锋、戚本禹 8 月 2 6 日给江青一份报告,其中谈到,当前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缺点,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例如捉人、打人的现象很多,特别是捉了、打了一些好人和中间群众;抄家的范围宽了一些;对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干预得多了一点。〔2 3〕依据这个报告,那就是中央文革认为:主流依然健康,破四旧是正确的。打人多了一些,但并不是完全不对;抄家范围宽了些,但也不是错误的。这个说法应当比王力的回忆更贴近历史真相,更贴近毛泽东的基本态度。

其实,王力自己并不是不清楚毛泽东的底蕴。他在另一份"申诉书"、而不是"反思录"中,为自己辩解时把"乱"的责任实事求是地都还原给了毛泽东。他说:"至于'不要怕乱'问题,那是毛主席反复坚持的观点。1966年7月8日,他(注:指毛泽东)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同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24〕王力在向中央厘清自己责任、抱委屈时脑子清楚得很,怎么面对人民和历史谈的却是另外一套说辞呢?真是内外有别呀!可悲的是他面对个人毁誉很在乎,所以畅所欲言;面对历史和人民却虚与委蛇,说禅般的虚无缥缈。他的《反思录》整体上是向着研究历史真实迈进了一步,但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却不是以历史的态度在反思。

在中央领导人层面,当年公开站出来制止打人的,目前看到的史料有两个:一个是周恩来在9月2日制定了一个《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提出红卫兵要"学习和掌握政策","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红卫兵搜捕人,必须与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门商定等项要求。但这个意见遭到康生反对后,周恩来甚至未敢呈报毛泽东而使其胎死腹中。〔25〕另外一个是出自陈毅之口。不过,他只能在他管辖的外事口提出他的看法。北京外语学院传达陈毅讲话说:"北京目前打人的风气很浓,不能提倡"。"红卫兵中有些东西是封建的东西,如骂人狗崽子","抄家没收一定要经过手续","无论如何不能排外","运动愈是搞得深入愈是要讲政策","偏差要及时纠正"。〔26〕

直到9月2日,北京市下发了《关于制止一切打死人现象的紧急通知》,提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从现在起一律禁止提供所谓流氓名单,违者要受纪律处分。除现行犯外,五类分子的名单,也不要向群众提供。〔27〕这个文件表明:一是破四旧当中,的确是由公安系统提供的名单,高层并非不清楚破四旧之所以如此蓬勃发展的根本症结在哪里;二是这个文件是在破四旧已经造成严重后果之后,才出台的一个供内部掌握的政策,表面上,宣传机构仍然在歌颂和鼓动着破四旧。

综上所述,红卫兵的破四旧是中共在文革初已经开始启动的"保卫毛主席"行动的延续,所谓抄家应当是和搜查枪支弹药、电台,清查特嫌等项工作密切相关的,很难说是红卫兵们首创的,相反倒很像是受人指使的活动。遣返则和清查清理社会人口关系密切,只不过对以往的政策加以扩大化而已。在这一过程中,红卫兵的破四旧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他们希望通过打乱现有政治格局的方式,完成发动群众和"清洗几百万"的目的。破四旧也得到党内老干部和地方党政机关的支持,他们以传统阶级斗争观念的惯性,继续把矛头对准剥削阶级,以转嫁矛盾的方式来力求自保。破四旧更得到了基层国家机器的支持,除了减轻其工作负担外,还通过这种方式消除了种种未知的"隐患"。破四旧也得到了以流氓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拥护和协助,除了所谓"阶级仇恨"外,他们与破四旧的对象们之间,还夹杂着贫富差距、文化格调、个人恩怨等诸方面的矛盾,还有住房、财产等方面的经济利益驱动。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成年人,如果说连起哄、叫好、看热闹的都算在内,可以说京城的多数成年人都在为破四旧呐喊助力,所以才可能使其成为现实。反过来说,在一个成年人掌控的社会中,青少年们的盲动如果成为可能以至现实,那就一定是冲到了成年人为其划定的轨道上。

破四旧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游戏。

注释:

- 1. 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 第96-100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年。
- 2. 周恩来接见科学院京区各单位代表谈话机要,1967年1月21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3.《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大事记》,中央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276页。
- 4. 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华夏文摘增刊》,第317期。
- 5. 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第96-1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
- 6. 刘景航, 2008年10月30日访谈录音整理稿。
- 7. 刘龙江, 2008年6月27日, 7月6日、13日访谈录音整理稿。
- 8. 王宇、侯瑛, 2008年11月22、23日访谈录音整理稿。
- 9. 叶剑英、戚本禹等接见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的讲话,1966年9月25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又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一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第251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
- 10.1966年 8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
- 11.《红旗》第12期,1966年9月17日。
- 12. 王力:《王力反思录》,第423-424页,北星出版社,2008年。
- 13.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第14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 14. 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2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 15. 刘进回忆: 卞校长去世后,我们觉得情况严重,应该尽快向上级汇报。当时知道中央在北京饭店开会,到那儿一定能找到领导。我们几个从学校一路走到北京饭店时,已经半夜了。起初我们想见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李不见,只好找第二书记吴德。……吴德听完我们的汇报,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这么大的运动,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

死了就死了。还说: 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等等。《回忆》,总第47期,2010年4月28日。

- 16. 陈小鲁, 2010年5月14日访谈录音整理稿。
- 17.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第14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 18. 江青1966年7月28日在北京海淀区中学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此话的另一版本,是李雪峰传达毛泽东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见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第176页,大风出版社,2010年。
- 19. 见卜大华:《我所知道的红卫兵》,《回忆与反思》之一。
- 20. 陈东林、杜蒲:《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册,第15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笔者注:这里的"呼吁书"指清华附中红卫兵等发出的制止打人的"十点估计",毛泽东的意思是否定的。
- 2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73页。
- 22. 王力:《王力反思录》,第423-424页,北星出版社,2008年。
- 2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13-11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 24. 王力:《向党中央的正式申诉书》,1988年8月30日,《华夏文摘》增刊,第551期,2007年。
- 2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 26. 周良霄 顾菊英编著:《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一,第377页。
- 27. 转自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第348页,大风出版社,2010年。

【口述历史】

访谈文贯中(上)

文贯中。顾训中。

时间: 2009年12月23日14:00~17:00

地 点: 上海市淮海中路 1 6 9 0 号 Boonna Cafe

访谈者: 顾训中 被访谈者: 文贯中

被访谈者简介:

文贯中,男,1946年11月出生于上海。1966年在上海市徐汇中学高三年级就读。 其父文强为黄埔四期,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大革命,1920末-30年代初曾经有过在中共 工作的经历,后作为国军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其母本已带着 孩子避居台湾,为寻找丈夫下落,返回大陆,羁于上海,因不堪政治迫害与歧视而于1955 年春自杀身亡。家庭的这些背景不能不给文贯中的生涯投下了阴影。他和兄弟三人从此只能由 阿婆(以血缘而言,是从小带大他们生母的奶妈,但文贯中父母一直尊她为长辈)照顾。这些 阴影和他在文革中的命运之间的关系也许值得记叙,供后人研究文革时作参考。

1968年文贯中被马天水,徐景贤因中串会而公开定为反动学生,关进牛棚。1969年春,文贯中被从牛棚释放后,立即被送到吉林农村插队,在那里度过了三年半的坎坷生活。1972年秋,因阿婆患病不起、气息奄奄,文贯中只得星夜赶回上海,原以为是办理阿婆的后事,不料阿婆又奇迹般地活了三年多,但半身瘫痪,生活无法自理。阿婆带大的几个兄弟都

在外地,文贯中寸步不离,予以照顾,并开始了在上海的三年"无业游民"生活。

1975年3月,其父文强作为最后一批获特赦人员获得自由出狱,文贯中兄弟等于是年秋天护送阿婆一起北上,始得与父亲在京团聚。历尽磨难而有伟大人格和爱心的阿婆此时已无牵挂,不幸于三个月后溘然仙逝去世。

文贯中在京做过公交车售票员、工厂搬运工。因长期坚持英语学习打下的基础,他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顺利通过考英语试,担任了刚刚恢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翻译,迎来了命运的转机。

1979年,文贯中考取复旦大学研究生,攻读世界经济,1982年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3年,他获学校推荐,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作访问学者;1989年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在纽约市立大学、美国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工作,现为三一学院终身教授。

按照父亲的遗愿,他将主要学术研究领域放在中国的三农问题。近年来,他的注意力又集中到李约瑟之谜、全球化和中国的城市化等问题。为此,他经常回到中国进行调查研究、参与学术活动。

文贯中的文革经历有着这一家庭背景人士的特殊性,值得关注。其中反映的一部分中学学生间的相互批斗、凌辱、欺压,以及其居住的上海"高档居住区"民众的遭遇,颇具典型性,亦值得重视。

(录音文字整理稿)

顾:首先感谢文先生!你在这么忙,事情这么多的情况下能接受我的访谈。我做这个工作当中难度很大。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不是很愿意接受访谈,对这些人我也比较理解,必竟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许多人哪怕回忆起这段过程来还会带来十分沉重的心情,我记得我们聊的时候,你说起过你的弟弟比较反对你说这些事,因为叙述的过程等于再经历一遍当时的场景,心情不会好。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确实感谢文先生!

我想做的访谈其实很简单,就是想保留一点这些历史。能保留多少就保留多少。现在的许多年轻人不了解这段历史,都在怀疑,可能吗?有这种事情吗?所以很需要有这样的保存。我做的工作更注重个人的感受,更注重个体生命的形态,在这样一个剧烈的时代变动当中到底是怎样一个经历、怎样一种感受。所以,我想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在整个文革当中,特别是在文革前面的一二年中的经历和感受。因为,这段时间对大家的触及更加深刻。我曾经说起过,从老百姓的感觉来说,到六四、六五年,好象这个社会开始在慢慢稳下来,开始有一些走上正轨的迹象出现了。象我们这一些人当时都在高中读书,可能已经开始在想我将来要考大学吗?考什么大学?读什么专业?好象有这么一种感觉,所以文革的发生、文革的到来,对我们这一代人,当然不单我们这一代人,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冲击。所以,我的想法着重点谈谈前面一段的感觉。我设计了一个题目:你是在怎样的环境下,怎样的情况下开始感觉到文革的风暴要来了,你当初的反应是怎样?

文: 我当时只是一个高中学生,所以不可能预知感到文革的到来。可能因为当时连刘少奇这样处于高层的人都不会预知 6 6 年以后将会发生什么天翻地覆的事情,象我这样一个学生更不可能知道的。但回想起来,当时应该讲也是有些迹象的,比如讲,批判《海瑞摆官》文章的发表,接着是对所谓时代精神的讨论,关于到底是"合二而一"还是"一分为二"的争论这种讨论,都引起我的强烈的好奇和激烈的思考。当时总体上的感觉就是,争辩的一方很不讲理的,这点我印象很深。看了这些骂街式的批判文章以后,我一般反而比较倾向于支持被批判的这一派。但必意不知道这些争论的背景,不晓得这些其实都是政治上将发生大变局的前奏曲。

从我一生的经历来说,我对所谓的阶级路线是很有看法的,因此也不会特别的革命或者特别的激进。当然,我在初中时曾一直想要入闭。

顾: 你打过入团申请报告吗?

文:初中打过很多报告,而且表现也是很积极的。六零年、六一年还是六二年时已经开始学雷锋了,我也做了大量的好事情,各种各样的好事情,蛮想表现一下,能够入团。与我一起做好事情的同学都陆陆续续入团了,而我始终遥遥无期。为此我与介绍我入团的班主任发生过争执,表示我不想入团了。我是当着他的面公开说的。

顾: 为什么发生争执呢? 是他与你说了什么引起了你的反感?

文:现在想起来,引起我反感的是,他一再强调,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要经受特别长期的考验。当时我们学雷锋,学生做好事,其实都是他安排的。我本人来说,从小到大倒是一直担任班干部,小学里还做过中队长。我自认为各方面还是比较注意进步的,不是从小调皮捣蛋的,所以被大家认为是个模范生。比如老师认为好的事,我都会自觉地去做。所以小学里当了小队长、中队长,我都觉得很自然,理所应该的。那时候还不是很讲阶级路线。

顾:小学是五十年代。

文:是的,五十年代。进入中学,到了退队的年龄,一开始自然而然想要入团了,年纪到了么!但是后来社会变得越来越左了,就不能够……,具体的爆发点,班主任是个年纪很轻的人,也是一个很积极的团员。他会整天想出各种各样的事情,现在想来就是哗众取宠,发动我们去做,做好了以后他会获得全校表扬。但我感到自己被弄得很忙很忙,都没有自己正常的休息和学习时间了,因为,当时我家庭困难,寒暑假要去打工的,

顾: 那时有什么途径可以打工?得到一点什么?

文: 是学校里安排的。

顾: 勤工俭学?

文:当时有劳动锻炼,例如送学生下乡帮助农民抢收庄稼,也有送同学去工厂,帮助工人干些零活。勤工俭学是大家都要去做的事情,这是学习期间的事。学期结束后,厂里说我们还需要一些年青人来帮我们做做零活,学校里会安排一些家庭困难的同学利用寒暑假,继续到厂里劳动,挣点钱。那么我是每年寒暑假都去劳动的了。你想,除了打工之外,我还要参加学校的各种各样的学雷锋活动,以及各种各样的学习小组,我就和这位先生(访谈者注:当时上海的中学里学生一般都称老师为先生)说,是否能减少几样社会活动?我想自学一点下学期的东西。那么他就开始套我大帽子:你不是要积极入团吗?你不是出身特别不好吗?你更加要表现,因为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他讲这种话我实在不得要领,因为他完全不是站在我的立场上对我表示同情和关心,而是讲这种虚伪的话。那我就说:好了,陈先生,我也不要再入团了!世界上不入团的人你也不能说他们全是落后份子,反动份子!我说,宋庆龄就是党外人士,不要说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尊敬她!

顾: 你那时就讲出这种话来了?!

文:对。

顾:倒是很不容易!

文:我要么不讲,讲出来的话都是很尖锐的!那么他就说:你怎么能和这样一种人比,你要想想自己是怎么一种出身。当时学校团委书记就在旁边,没有过来劝架,但他完全听到了。吵是在初二结束后的夏天,也是我勤工俭学最忙的时候。到了初三,那位先生见了我,就对我说,你入团问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你自己看着办!我就说:我还是这个意思,我不入团了!所以初三起我不再争取入团,一直到高中,从来不再打入团报告!学校里好的事情我还是积极参加,但并不是为了入团。所以,高中三年我还是班干部,但就不再为这个事情费心了。

顾: 你这个班干部是哪一类的? 是学习方面的还是……?

文: 我记得什么都当过,有学习委员,文艺委员,墙报(宣传)委员,到后来就变成了劳动委员,大概是因为我寒暑假总到工厂去,对工厂和劳动很熟吧!

顾:我想象当中,你应该是学习委员、或者是课代表之类的。

文:课代表之类,从小也是经常当的,但后来渐渐地就不让当了。例如,我很喜欢英文,但高中以后连英文课代表都不是!实际上我英文在班上是比较好的,而且还为学校争过光的。因为当时徐汇区有一次英文朗诵比赛,我是得奖的,关于我得奖的通告在学校的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张贴了好几天。但是没用场,我高三担任的是劳动委员,组织大家一起去劳动。当然,我也无所谓!课余时间学校要我去帮助功课不好的人,我一直是班上功课比较好的人。实际上我差一点点没考取五十一中学(访谈者注:五十一中学当时是全市唯一的一所五年制的市级重点中学,现在恢复了)。小学毕业的时候,所有成绩都及格了,但是政审没通过。政审不通过的原因是我们校长发现我的档案袋里是空白,所以她很耐心地劝导我好好填表。可是我讲:我家里没大人了,没人知道我家真正的历史,我也不能瞎填,怎么办?"因为那个时候我母亲在我小学一年级时已经自杀,我父亲当时还在秦城(访谈者注:指位于北京郊区的监狱,专门关押国家要犯),带我大的婆婆是不识字的,所有亲戚都和我们断绝来往。所以我没办法填表,我总不能伪造历史。所以我就说,我实在不清楚家里的历史,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她劝了我一阵后说:"你是自毁前程了,那就听天由命吧。"我也没有办法。我们学校就我一个人报名五十一中学,对我有这个机会进入这所学校她也蛮珍惜的。

顾: 这是小学考初中? 考五十一中学? 其他全及格了?

文:是的。为什么我考五十一中学,是因为可以早毕业一年,可以早一年参加工作,让抚养我的婆婆早一年享清福。我的小学校长姓穆,在暑假的一天晚上派校工把我叫到学校,对我讲,"五十一中学来信要你的政审材料,我打开一看,你的档案几乎是空白的。"她并推测,成绩不及格是不会来政审的,所以她认为我的成绩肯定是没问题的。对成绩我是很自信的。我记得我是与我的邻居一起去考的,邻居的母亲是小学教师,她托我照顾她的孩子的,因为我从小就是个小大人,她叫我和她小孩一起去考,

顾: 自理能力很强的。

文:我从小就是少年老成,她就和我说:你和他一起去、一起回来,将她的孩子托给了我的。我们俩人在路上商量好,将答案全抄下来,出来时两个人可以对一对。出来时我们对了答案,其他都一样。他成绩也很好的,他后来是考取这所学校的。但有一道题,我记得是2的3次方,他说是不是6,我说应该是8,这道题对了是会加分的,那么至少从分数上说我应该比他还高一点。另外我的语文成绩从小就很好很好的。他的语文成绩我知道,不是很好。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我的成绩是没问题的,但是到头来还是没考取。

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差不多有一半都进入南模(访谈者注: 指上海市徐汇区南洋模范中学,

是所市级重点中学)的。当时大家都认为南模比较好,离家比较近。我呢因为我婆婆希望我小学毕业就去考技校,读技校三年毕业就可以做工人,就可以接家里的班了。否则的话,那时她年纪已经很大了,70多岁了,我弟弟还很小,我三哥已经到安徽去了,还有两个大的哥哥在湖南,都帮不上忙。开始时我也同意的。后来有许多同学讽刺我,讲成绩蛮好的一个学生,却要去做技工了,似乎很没有远大的抱负和志向,听上去很难听!另外,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都表示说,他们的愿望是将来做个科学家等等,这其实也是我从小的理想,做科学家、做文学家、做哲学家什么的。但是,由于在阶级路线的负面影响,渐渐地对前途变得不是很清楚,尤其到高三面临毕业时,一想到前途,便觉得眼前一片昏暗,很不清晰楚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且我弟弟此时已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了!

顾: 你弟弟读到几年级?

文: 他只读到初中。其实他成绩是很好的, 但就不让他读书了!

顾:是家里的经济问题?

文:不是经济问题,主要还是学校不录取了,读书了就不考虑经济问题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不让他读书。他复考过,有位监考的老师是我们的邻居,说他成绩很好,阿婆满心以为他会考上,结果却又没有录取,街道就动员他到新疆去。所以,文革前他就走了,到新疆去了。

当时我的感觉是,社会很不稳定,一直在演变中,很多政策经常变化,作为微不足道的个体,出身又不好,自己对前途是极其没把握的,只能随波逐流,尽量适应,力求生存下去。当时我有一个很好的初中同学,他前段时间还特地从德国回来看我。他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德国人,他是个混血儿,小时候曾参加少年宫话剧团。从他扮演的角色的转换就很能说明问题。一开始叫他扮演苏联专家。后来讲他母亲是西德人,就让他专门扮演美帝国主义分子。扮演苏联专家的结局是很好的,往往是在中国人找不出解决的办法,一团混乱中,苏联专家从天而降,发了一套指令后,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他就被当做众人的英雄。扮演美帝国主义分子,下场就很惨,啪啪几响他就要倒在台上,然后大家鼓掌,欢呼革命的胜利。他妈妈在台下看了也蛮伤心的!他妈妈判断,象他孩子那样的出身,背景如此复杂,以后在中国不会有什么前途,所以毅然决然采取假离婚的方式。他妈妈带着他这个男孩子出国了,他的妹妹则跟父亲,女孩子还留在了中国。不过,他父亲后来还是碰到了许多问题,文革中他父亲被冲击得很厉害。我朋友1963年春天离开中国。临走时我一直问他,你究竟为什么要走?他最后就是这么告诉我的了。

所以,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我也认为自己肯定不会有什么前途的,所以也做好了两手准备:如果能考取一个三流大学,那么就读下去;如果不能够读,就像我哥哥或我弟弟那样,也只好上山下乡。但是我还是很关心政治的,各种报纸、社论都看,看后自己也有一些想法的。有些地方我也是同意的。譬如当时的"九评",将世界上的第三世界描写成处于一片水深生火热之中,我当时也是比较相信的,认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在道理上是对的,和平议会的道路在道理上是错的。但是,又感到中共在做法上是比较生硬的,是以一部分人牺牲自己的利益作为代价的。我只好怪自己出身不好,成为这场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

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爆发,我认为是"五一六通知"下来,正式宣布停课闹革命的那一刻。 在这之前还遭到一件事。我们每年班里都要演出一个节目,作为学校里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我 记得好象是元旦,大概是向六六年初的元旦献礼,我们有一群同学人包括我在内,想要排演《江 姐》的几场戏,因为当时我们十分喜欢这出歌剧,很佩服江姐的英雄气概,认为戏蛮好的,

顾: 当时很流行的。

文: 这出歌剧很流行的,尽管我出身不好,但我也还是很喜欢这个戏的主题和里面的歌的。我

也没想到我的家庭背景与这只戏有某种关系,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同学们一开始推我做导演,我也确实将里面的每首歌都搞得很熟,把剧情也搞得很熟,对一些人也作了指导,这个戏的演出后来获得了全校的好评,

顾: 班里的演出?

文:是代表班级所作的全校性演出,低年级的学生把我们看做他们的大哥、大姐,认为我们的演出已经有了很高的水平,唱也唱得好,做也做得好,当然主要是演的人演得比较好。我自己也很开心的,因为我也从头一直参与到结束。但是到"五一六"通知下来之前,开始有点风风雨雨。徐汇中学团委书记在一次校报上(就是墙报),发了一篇文章,我感到很奇怪,意思是说,有种人出身是极其复杂的,怀着别有用心来演这个戏,把革命英雄演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叛徒、国民党分子演成了英雄,文章好象就是这种含义。这种话实际上是在影射演员,因为演江姐和其他角色的同学的出身不是工农兵,另外也影射象我这样的人,因为我是作为导演参与这个戏的。我看了后很不开心。我们演革命戏不好,不演又要说你抵制革命戏,当时就是这样的感觉。

另外,我也感觉学校里的教育有点死气沉沉。因为先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太生动活泼了人家要说你离开了党的路线了,那么你沿着党的路线讲下去,都是官腔官调。我们有个副校长,他很想打个教育翻身仗。就是这个原因,他把当时上海中学、五十一中学和南模"淘汰"下来的人(六三年时淘汰了很大一批人,种种原因,主要是讲他们出身不好,他们的成绩其实还是可以的),都收到我们徐汇中学来,他想提升我们学校的水平和高考录取率,就召开了一个所谓的教育革命会,这个会我也参加了,慷慨激昂地作了发言。我记得我发言的内容是讲:第一语文课里的选材许多文章都是党八股,另外我说,教育的方式也很不好,是否能搞得生动活泼点,比方说基础语文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些剧本,然后让大家来扮演各个角色,这样就使学生能动地学习语文,非但能学里面的修辞,而且还可以改进自己的读音、表演,这样语文就学得活了。但我的发言不涉及什么资产阶级路线啊、修正主义路线,与这些都是不搭界的。文革一开始,学校里有一帮人,我记得一般是功课不好的,受到歧视的,他们首先去造反的,相当厉害地斗校长、党委书记……

顾: 这些人的出身情况如何?

文: 出身一般都比较好的。

顾: 他们倒没有保守? 造老师的反不是造党支部的反。

文:出身好的人里面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成绩不好的,其他表现也很一般,不算积极分子,虽然出身好,但平时不是校当局的红人,那么这时他就容易出来造党委、团委、老师的反;还有一部分平时是学校当局的红人,那么,这些人容易变成保守派,要去保护重用他们的校领导。从我来说,我完全是个旁观者,而且我觉得造反派的有些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比方说把大家平时都认为过于严肃的校长兼党委书记叫到斗争会上,叫他跪着,说他是地主分子,弄了一个很高很高的高帽子叫他戴着,然后将一桶很稀的贴大字报用的浆糊倒在他的头上,一个人给弄得简直不象个人样,可怕极了,然后……

顾: 这都是你在旁边亲眼看到的?

文:是的,因为是全校性的一个大型批斗会,要大家都去参加,那么我也去参加了,目睹了这一切,感到惨不忍睹!虽然我对校长这个人没有特别的好感,因为他对我个人从来没有过什么特别的帮助或关心,但是我心里为他叫冤,难道文革就是斗校长吗?为啥要这样做?当时,凡

是我不同意的口号,做法,我会忍不住就和提倡者讲道理。当时我们徐汇中学对立面一派的几个主要骨干,是我们班的,其实平时我与他们的关系也蛮好的。其中有一个姓唐,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他当时就在我们班的教室门口要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让每一个进门的同学一眼就能看到这幅对联。我就和他辩论,叫他别贴,第一,这个标语本身就是错误的;第二,你贴了以后下次你会很被动的。他问为什么。我就一个个分析,中国高层的领导人几乎没有一个出身好的,怎么叫基本如此?而且你仔细想想,这是违反党的阶级路线了。党的阶级路线是讲出身不能选择,而通过个人的努力,自己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你现在讲基本如此,是背离阶级路线的。但他一定要贴,结果他还是把这幅对联贴出来了。

在好几次的这类互动接触中,我越来越不喜欢学校里的这种恐怖的造反气氛。这位造反派领袖也蛮好,就对我说:那么你就出去串连去吧!他帮我开了一张证明,介绍我是一个革命群众,到全国串连。所以我从9月中旬起就外出串联去了,一直到12月才回来,因为当时天气实在太冷了!

顾:我打断一句,我在想,你这样的家庭背景,你出去会受到什么阻力吗?他给你介绍的背景 是革命群众,是以学校的什么名义介绍的?

文:学校革委会呀!上海市徐汇区徐汇中学革委会名义,有红图章的。而且在外面我也不和人家多罗嗦。我每到了一个地方单位,总悄悄地找个对外接待串联群众的单位地方住下来,当时都是睡统铺的。

顾: 你是一个人?

文:我永远都是一个人,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出身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我也不是一个会信口撒谎, 乱编自己出身的人。

顾: 那么你到那些地方去主要去做什么呢? 比方看看大字报?

文:大字报也看一点,特别是在北京,看了很多大字报什么的。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逛风景名胜。因为我从懂事起,就没有离开过上海,没有出去过,我连父亲那里也没去看过他。现在这样吃不要钱,坐火车不要钱,到了一个地方,冷了还会发件军大衣,借给你穿穿。顶多碰到接待站里面的人要我去帮他们的忙,那么我也会去帮他们的忙。有一次在西安,有个革命老妈妈与我说,现在来了帮上海小青年,好象岁数比你小很多,很不懂道理,什么事都不听我们的。吃饭也不准时来吃,等到饭过了又吵着要吃饭。晚上大家都睡觉了,他们还要哇喇哇嗽地讲话,也听不懂他们讲什么。你是不是帮帮我们的忙。于是我就帮他们忙,无非也就是作为老大哥,先与他们交流交流,关系拉得近点,他们也知道我是上海人了,知道我是上海徐汇中学过来的,然后我与他们讲,你们从外面过来的,年纪轻,讲话要注意点。否则,不要看现在你们很凶,当心出门碰到恶人。你们现在得罪人太多了,你们到底是出门在外!他们说:是伐?倒是要当心点!我说,晚上他们说什么时候睡觉,你们就别吵了,就什么时候睡觉!

我大部分时间与别人不搭界。我自己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我今天要去看一个什么庙,那么就去看那只庙。每个地方都有风景点的,那么就去看一看。然后学校是必到的,这个地方有哪几个学校,总是要到一到的。

顾:是主要的学校,是吗?

文:是的,主要的学校。北京是所有学校都兜了一遍,有的学校要连续去好几次了,因为那里大字报多么,那么就去看一看。还有,各种景点也去看一看,例如未名湖。有时也会去交点朋

友,但都是些同路的。譬如说,我们一起到长沙去好吗,那么就一起到长沙去。到了长沙以后,可能还有几天与他们混在一起,但时间久了就分开了,从来没有与别人长期地搞在一起。因为 我本来就不是要去参加什么组织,或者我自己要去搞什么组织,只不过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后 来也走厌掉了,另一方面也很想我婆婆了。

顾: 你走了多少地方还记得吗? 是哪一条路线出去的? 上海先到北京?

文:没有,我是先到南京。在南京逗留了很多时间,南京很值得逗留的,中山陵,紫金山,玄武湖什么的。然后又到了北京,北京逗留了相当长时间,因为那里学校多,另外还等待接见,

顾: 你是哪一次?

文:应该是10月份的,因为出去已经是9月份了。

顾: 10月国庆有一次, 你大概国庆节一次没参加, 后来大概10月15日还有一次。

文:那么我大概就是10月15日。

顾:后来大概是11月头上有一次。

文:我记得我参加了两次。两次的原因是,当我返回北京的时候,他们说又有一次机会,那么就再去轧闹猛!

顾: 然后北京出来又到什么地方去了? 去东北了还是去什么地方了?

文: 东北没去,就到郑州啊、西安啊,又返回来,返回北京;后来又到洛阳、河南兜了一圈,又到武汉呆了很多时间,因为武汉那时还不算很冷,东湖啊、武汉大学啊,都兜了一下;然后又说去韶山,于是又到了长沙、韶山兜了一圈;这个时候再要到广州去,车子挤得不得了,就一路一点点向北返回,最后不知为什么,又跑到了北京。

顾: 北京又去了一次?

文: 我不是接见了两次?这是第二次。

顾: 然后从北京再回上海?

文: 然后从北京再到山东。到山东逗留了一段时间,那时已经很冷了,大名湖都结冰了,然后再回上海,到上海已经12月份了,这样兜了一圈。当然在这当中,我也给我婆婆写了些信。她不识字,就叫邻居读给她听。反正她知道我安全就可以了。

顾: 你12月份回来以后,学校运动的高潮应该是差不多了,是吗?

文:回来以后的情况是这样的:我马上到学校里去了一趟,看看学校情况怎么样了。发现学校已经没有人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中央文革已经表态了,讲反动血统论是错误的。这倒是我在北京时就已经看到有大字报在批判了,讲反动血统论是错误的。我想我早些时候自己的判断也是对的,很高兴。

顾: 而且在12月这个时候开始抓"联动"分子了。

文:是的,"联动"分子捉起来了。我回来后感到怎么会找不着人?有的家长就告诉我,他们的小孩都出去串连去了。我在外面差不多有两三个月,总的感觉是,这场文化大革命也快要结束了。因此,我回到家里,心比较定,就将所有参考书拿出来了。我收集的参考书很多,摞起来好有好几迭高。

顾: 你那个时候是高三,本来马上要考大学了,六六年就应该准备考大学了。

文:对,当时我们已经准备要考大学了,后来说暂时推迟。那么5月份搞到12月份,搞了半年多了,那时我心很定,每天在家温书。我婆婆也说,你在外面走了那么多路了,在家多呆些时间。于是我就在家温书。

有一天突然闯进来许多同学,平时与我很要好,但出身都不好的,做我思想工作,他们回来后要成立一个战斗队叫"自觉红",不是"自来红",名字也想好了,希望我能够加入他们。然后就一个个诉苦,讲国庆节前后他们受到如何如何的虐待,家里抄家不算,还勒令他们到学校集合,然后打扫卫生,他们感到很惨很惨的,还饿饭,饭都没有吃。当全校学生10月国庆节要出去游行,他们这些人被剥夺政治权利,关在学校里劳动,

顾:我想问一句,这些事情是同学做的、还是别人做的?

文: 就是对面那派人做的,

顾: 就是同学斗同学? 同学带着人到别的同学家去抄家?

文:对的。就是我走了以后,放我出去的这批人,对剩下来的出身不好的人一家家地做这种事情。象演江姐的女同学,极其漂亮的一个女同学,竟然被剃了阴阳头!

顾:同学剃同学的阴阳头?

文:对!她是住在复兴西路的,被剃阴阳头后没有脸再到学校来,就勒令她每天必须到学校里来。等她到校的时候,已经有人等在门口。她戴着一顶帽子想遮盖遮盖。他们等在门口就是想要她好看!她一进校门,她那顶帽子就被人抛到半空,然后大家就叫:啊呀!看这个人呀!怎么怎么,还用脏话骂她,然后再勒令她今后每天到校,来来回回都不准戴帽子,

顾:路上都不准戴?

文:路上都不准戴!这是这个女同学的和我说的。当然她并不是这个战斗队的,她并没参加, 是后来我听她讲的。但来我家的同学中很多被人家抄家,被人家关在学校里,写检查、饿饭、 反省······

顾:我不知道面上的情况如何,至少我们学校,同学与同学之间这种事情有,但是个别的。你刚才说的情况在你那个学校是普遍的,把你们一个个都要轮到,一个也逃不掉。你倒是属于特殊情况,等于事先已经将你放掉了,留在学校的人中没有一个逃过的?

文:对的,除我之外的出身不好的同学中家里没有一个逃得过被抄家的。我与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很要好的。我以前与班里各种各样类型的学生都可以说上话的。这些人出身与我比较相近,功课比较好,当然我也蛮同情他们。他们说:他们现在想要翻过来,因为江青是站在他们

一边的,对面一派的做法是不对的······其中有姓邹的一个好朋友,他是五十一中学过来的,我平时与他的关系也特别好。他有句话说得蛮重的。他说:文贯中,大家都在搞文化大革命,你怎么会一个人自顾自在家温书?他的潜台词是:像你这样想要抵制文化大革命的人,以后还想上大学?!这种和社会潮流公开对着干的事我是从来不做的!我从小到大,反正你政府或者党号召的事情,大面上总要去做的。比如学雷锋,那么就去学一学,不会说我故意要去抵制,我是不会的。

刚才我忘了说了。当时;"五一六"通知发出来的时候,叫大家组织听广播,进行讨论。讨论过程当中我也蛮同情出身很好,但功课很不好的同学。他们在学校里也很抬不起头。我想这样也不对,他们这样的人至少也应该让他们能够跟上去,功课能够好起来。假使他们不能上去的话,那么工农兵以后怎么翻身呢?没有知识如何翻身?出于这个方面的考虑,我认为教育是要改一改,使得工农子弟也能够读书读得好起来。我就是这种想法。文化大革命当时还没有亮出来要把刘少奇怎么样。

当时我就讲,对反动血统论我也是有意见的,那么就参加你们的战斗队吧!参加了以后我就发觉(当然这是事后反省),他们一点点一点点把事情都推到了我的头上。比如说写大字报,几乎每次都是我写的。讲起来么,说你写得快,你写得好什么的,其实他们背后都是有家长指点的,出身不好的都有文化很高的家长,会和自己的子女讲,每次运动证明都会突然转向,你不要去给我闯祸!

顾: 要秋后算帐的,

文:要秋后算帐的,不要去搞!什么反动血统论,不要去串在里面!我记得最最有名的一次,是我们全区大辩论,选择在我们学校。我们学校派我作为主辩者,南模有一个高干子弟作为另外一方的主辩者,内容是反动血统论,辩论了一两个小时,相当激烈。 顾:你大概没有人来告诉你,提醒你,所以你就冲出去了,

文: 那是大家要我做的。

顾:你冲出去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人家对面是高干子弟,他要讲血统论怎么怎么对,你是这样一个家庭背景······

文: 我要反对他的观点。

顾:因为你的背景,假如另外一个人,比方他是家庭出身蛮好的人,他来说血统论不对,这倒还可以,纯粹是个辩论。

文:我还是用上面说过的逻辑,中央领导人里出身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他们现在都成为……,然后讲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是破落贵族,恩格斯本人就是资本家,一生都是资本家,怎么叫"基本如此"?另外,中央文革反对血统论的东西已经出来了,所以我的底气还是有的,不是说一点也没底气。否则,我只能在小范围内与他们辩论,不可能搞得那么大。我们学校有很大一个柏油广场,广场上面有一个台阶,连着高出地面的平台,成为一个天然的舞台,下面人山人海。辩论最后是以我获胜,因为对方的理论毕竟是逻辑不通的东西。

顾:场面上是你获胜了!

文:结果他们对方一帮身强力壮的人冲上来想要夹持我,殴打我,我们一派的人马上把我保护起来,将我保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个场面就这样过掉了。

顾: 这大概是几月份? 应该是六七年的几月份?

文: 六七年春天的时候,大概三四月份。你想,他们那帮人回来已经是一二月份了,然后再开始一点点要有个过程。弄到我们一派气势比较大的时候,我想应该是三四月份,因为我感到那时天气不是很冷,在露天可以辩论么。这种事情后来就越来越多,我觉得对面一派对我就越来越恨,

顾:怎么叫越来越多?除了这次,后来又辩论过?

文:反正双方又写大字报互相批判,各种场合又发生冲突……实际上有帮人由于个人的遭遇,始终耿耿于怀,希望归还被抄家的东西等等……

顾: 当时怎么会提出这么具体的问题?

文:我们这派肯定认为根据反动血统论抄家,打人是不对的,怎么学生能抄学生的家?!既然在批判反动血统论,显然要求改正错误,所以归还,赔罪的事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否则你具体讨论什么东西呢?那时高考、升学都不是议事日程上的事了!这时我越来越看清楚,这场运动不知要搞到什么地方去了,高考完全丢到后面去了。因为这时文革要升级了,对刘少奇他们要批判了,

顾: 4月1号戚本禹的文章出来了,

文:对,文章出来了。这种信号都说明,下面还有大事情了,一桩桩大事情!

讲起来我们学校还有一个人也是蛮有劲的,现在与我也蛮要好的,他叫陆丙甫,他当时成立了一个"老三篇战斗队",讲要学老三篇。他当时就提出来,刘少奇是三反份子吗?他在学校里发动了一个很大的辩论,是公开的。他是主辩者,各方面的人都去反驳他,但是都被他驳倒。他的意思是讲:对一个人的判断不能仅仅根据一篇社论,要看历史事实。历史事实现在不清楚,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挖掘历史,这当然变成了一件很复杂的事。人家就认为,他不是紧跟文革、紧跟中央,这是很可笑的一种罪名,他将这些东西全部都驳倒。他说,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要造反,不正是证明了以前的东西是错的?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去造他们的反。但是我们在造反中是不是又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又被蒙蔽了?有没有这种可能?这种思想是很深刻的!

顾: 他是你的同学?

文: 他是我的同学, 一届里的,

顾: 那个时候能提出这样一些想法是想得很深了!

文:是想得很深!我虽然认为他这个人的思想方法都对的,但是当时我主要是关注反动血统论,并没有卷入到他这个里面去。他后来也被打成反动学生,和我一起蹲在牛棚里。我蹲了一年,他蹲了半年。

顾:后来"中串会"(访谈者注:该组织全称叫"上海市中学生串连会")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他和"中串会"是不是一回事?

文:他和"中串会"一点也不搭界。"中串会"是怎么回事呢?到了六八年,中学生还没有能够联合起来。原因是:受到迫害的一派学生一直感到他们没有受到公正对待。中央文革当时对批

判反动血统论已经不敢兴趣,他们的兴趣已经转移到打到刘少奇上面,认为一些学生被人家打了,被人家折磨了,家里被人家抄了,是微不足道的事,应该尽早联合起来,一起跟随中央文革去批判刘邓路线。当时我们这一派的诉求却是,希望深入批判反动血统论。实际上我们知道,文革前十七年所执行的阶级路线本身就有问题,,也应予以批判。但是,市革委越来越倾向于另一派,另一派实际上是执行反动血统论的。但是那时又成为主要依靠对象,因为他们出身好。在这个形势下,中学生就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联合起来,至少不可能主动联合起来。从上面来的压力是蛮大的,压力下来了,一定要复课闹革命,一定要去除派性,有派性的某些人要打成极左思潮。这都是他们随心所欲说的,这怎么能叫极左思潮呢?

顾: 你说的没联合起来是指你们徐汇中学?

文: 全上海都没联合起来,

顾:中学红代会不是已经成立了吗?

文: 这主要是他们那一派的,

顾: 是单方面成立的?

文:主要是他们一派的人,以及我们这一派中愿意接受折中的、或者妥协的,也进去了,但是还有另外一大批人。我至少可以讲,我们徐汇区每个学校总有另外一派,对反动血统论还是持批判态度的。我们感到我们也应该串连起来,大家一起来想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本来我们就不是接受上面任何人领导的,那么现在也就是这样,我们大家自己来想一想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起草了"七点声明"。现在很奇怪,说是这个"七点声明"也找不到了,

顾:"七点声明"是谁起草的?

文: 我是主要起草者,但还有一些其他学校的笔杆子参加。

顾: 那是"中串会"最早的一个雏形有哪几个学校、哪几个人发起的?

文:说不出来是哪几个人发起的,应该说是很自然而然形成的。譬如说,你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分布在其他学校,大家见面时一看是观点是一派的,就会自然地把自己所在的学校的自己参加的一派串联起来,那么就一点点形成了······

顾: 哪几个学校是主要的?

文:比较积极的应该讲是徐汇中学,南模,五十四中学……

顾: 都是以徐汇区学校为主?

文:不是的。象你们育才的周松强他们也参加进来了。应该说每个学校都有点人的,我们当时 串连出来的人,象上海中学,交大附中,同济附中,控江······都有。

顾:面已经蛮宽了!

文: 我记得静安区的市西中学、卢湾区的光明中学、南市区等都有学校参加进来过来! 但我平

时主要在徐汇区参加活动,所以对其他区的人的印象不是很深,不清楚他们是否在"中串会"的活动中扮演很积极的角色。

"七点声明"我是主要参与者,还有一些南模的人啊、其他一些学校的人,不但在执笔的人中讨论过几次,还送到各校去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几次,应该说直接,间接参与讨论的人是蛮多的。

顾:"七点声明"的大体内容呢?

文: 我现在回忆不起来了!

顾: 主要基调呢?

文:主要基调,大概关于反动血统论是有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反动血统论的余毒还很深,影响两派的团结,要大联合,就要继续肃清反动血统论。总的是对当时上海的中学运动发表我们自己的看法。当然,也接受了某些中央文革的口号,要复课闹革命,要团结起来,大方向肯定是这样的,也不会公开反对这种事情的。还有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要有一些做法,这些具体做法显然与市革委会不是唱一只调子的,所以,他们是不喜欢我们的。七点声明出来以后,

顾:这"六点声明"是在什么范围、以什么形式发布的?

文:好象单独有一个"号外",是铅印的,印的量很大,并被到处张贴。各个学校都有这种很积极的人,虽然不写,但对张贴大字报和传单很起劲,他们到全上海的大街上和各个中学张贴,

顾:下面的署名就是上海市中学生串连会?

文:全名叫什么,我一下子倒记不起来了。其实中串会不是一个组织,只是一种串连形式,实质上是很松散的,也没什么人说我是这个串联会的领袖什么的。

顾: 所以叫串连会。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